

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与现状

沈立新

一、历史的回顾

第一时期:美国华人的参政始于本世纪40年代。夏威夷州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发祥地。华人谭善福于1942年以共和党身份被选为夏威夷毛依郡行政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首次当选为该郡郡长,1964年11月4日再度当选为该郡郡长,此为他共9次连任这一公职。亦在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李察臣,于1963年当选为夏威夷州副州长,此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州长。1948年,另一位出生于夏威夷的美籍华人邝友良,出任夏威夷州众议院议长,1959年夏威夷并入美国联邦后,他也于同年被选入美国立法机构,成为美国参议院议员,首届任期6年,后来连任数届,中间经过5任总统,前后任期达17年之久,因而有“长寿议员”之称。邝友良为美国参议员中的首位华人,也是进入美国参议院的首位亚裔人士。

另一位美籍华人邓悦宁(1904—1977),原籍广东。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他于1946年竞选成功,出任亚利桑那州议会议员,并于1960年当选为美国国会参议员,先后在美国政坛活跃28年。一般认为,上述4人为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者。

在上述时期内,还有一些华裔精英相继走上美国政治舞台,担任美国各级权力机构内的公职,主要的有:加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女士、洛杉矶市法官黄锦绍、西雅图市参议员陆荣昌、亚利桑那州法官邓心平、旧金山市法官刘百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德市市长胡璉、纽约市司法警长李卓生等。

第二时期:如果说在第一时期内,美国华人的参政为起步阶段,仅限于个别华人精英以个人努力、个人奋斗,通过竞选获胜或被委任而步入美国政坛的话,那末从第二时期开始,华人参政意识大大加强,表现力更大,步入政坛人数更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赵小兰、总统经济顾问甘敏才、白宫国际商务顾问黄仲元、总统国家教育顾问余显利、联邦商业部副部长胡少伟、特拉华州副州长吴仙标、打破五次连任纪录的加州州务卿余江月桂、蝉联六届俄勒冈参众两院议员的邓稚凤、蒙特利尔公园市参议员、市长陈李琬若、加州喜瑞都市市长黄锦波、旧金山市议员谢国翔、洛杉矶市议员胡绍基、纽约财政厅厅长赵光华、纽约警察局副局长莫虎、大法官刘成威、伍元天、谭国桢、陈翠芳、谭碧文、助理国际部长吴元黎等。

第二时期的华人参政特点为:(1)华人参政出现了群体意识,参政的声势大,热情高,人数多,不分党派、地域、社团,共同为争取华人的政治合法权益而奋斗,由此形成了参政热潮;(2)华人参政的地域范围扩大到美国的几十个州,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知识阶层在参政中起领导作用,一批华裔政治女强人脱颖而出;(3)华人的参政活动逐渐得到其他族裔(包括白人)的理解和支持,包括美国总统竞选时也重视华人力量,积极予以争取。

二、参政高潮形成的原因

华人移居美国的历史,据资料记载,最早是在1785年,距今已有两个多世纪,如果从

19 世纪中叶赴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算起,也已有一个多世纪。那末,华人的参政为何直至战后才开始,到 70 年代后才形成高潮呢?这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它不但与国际时局、美国移民政策发生变化有关,更与战后华人自身在思想观念、经济地位、文化知识水平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有关。

第一,战前美国华人均抱着“寄居”打算,他们的家属都在国内,急切巴望能通过艰苦奋斗,积攒起一笔钱财,早日回家光宗耀祖,叶落归根。因此除梦想早点发财回国外,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中国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才是他们息息相关的事,对居留国政治,普遍持“客居”心态,从不关心,更谈不上参与了。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中美成为盟国,就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美国于 1943 年废除了《排华法案》,每年给予中国一定数量移民配额,并允许华人在美国归化入籍,华人在美国的合法地位终于在法律上得到承认。70 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使许多旅美华人与祖国的亲人通过合法途径在美国团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加上美国政府放宽华人入境及华侨加入美国国籍的限制,于是自愿归化入籍的华人越来越多。从此华人由原先寄居的“客人”,转变为久居的“主人”。美国华人开始买房置产业,有的还和异族通婚,这些均反映华人准备在美国扎下根来,繁衍、发展下去的想法。

从“叶落归根”到“入地生根”,美国华人这一国籍观念的改变,也使他们过去那种不过问政治的心态发生改变。既然美国已成为久居的家园,自然就应该注意、关心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政治兴趣、经济发展目标也从祖籍国转变到归化国来,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积极争取华人正当的政治权利。

自从 1965 年美国颁布新移民法后,华人以移民身份到美国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大约每年在 2 万名以上。自 60 年代起有大批来

自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加上从东南亚各地去的华人,使美籍华人人数在过去的这年内翻了几番。例如,1960 年时为 2.3 万多人,1970 年时为 4.3 万多人,1980 年时为 80 多万人,1990 年时为 164 万人,目前估计已超过 200 万人,成为亚裔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前,华人人口太少,势单力薄,使华人参政成不了“气候”的话,那末今天,由于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势众,其力量已不可忽视,华人在美国政坛上的“筹码”大大加重了。

第二,华人最初是作为华工到美国去的,他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微薄,经济力量弱小。在美国,任何政治活动均与金钱密切相关,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华人,根本不可能有参政的奢望。

二次大战以后,华人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在进入职业领域的同时,生活也开始富裕起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不断扩大。特别是 1970 年以后,华人从事专业、技术、文职等白领行业的人数已占就业人数的 54%,许多人的年收入均在 3—4 万美元以上,有的高达 6 位数,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华人参政奠定了物质基础。

华人的经济利益与当地的政治态势息息相关,他们知道,只求经济上而不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是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只有通过政治地位的提高,才能保证经济地位的巩固和发展。

第三,早期赴美的华工大部分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其中大部分是文盲,或者识字不多,他们抵美后因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学习。没有文化,语言不通,加上文化背景迥异,使他们无法熟悉了解美国文化,也不能与其他族裔沟通和交流。二次大战以后,华人的知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华人知识分子队伍扩大了,例如在 1950 年时,男性华人中拥有大学学位者只占 7%,而到 1970 年时已占 24%,不但高于其

◁《社会科学》1994 年第 11 期▷

它少数民族,还高出美国平均数的一倍。目前在全美的第一流科学家共 13 万人中,华人占 4 万。随着华人群体知识水准的提高,其职业分布也发生很大变化,目前,华人知识分子广泛分布于商业金融界、文化教育界、科技工程界以及研究所、医院、实验室和各所大学。从过去的“三把刀”(剪刀、菜刀、剃头刀)到今日的“六个师”(大学教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师和建筑设计师),可见其变化之大。

许多美籍华人学有专长,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通晓美国文化,理解美国精神,没有语言障碍,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获得巨大成就,受到社会的尊重,群众基础坚实。这批崭露头角的华人知识分子,已融汇于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关心政治,思想敏锐,对自己应享有的权利义务,对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充满信心。华人知识阶层的出现,不但开华人参政风气之先,也是华人参政的鼓吹者。他们知道民权不是赐与的,民权必须来自积极的参与和争取。近年来华人参政的代表人物,均是华人知识界中的出类拔萃人物。

三、现状与障碍

美国是个政党政治国家,要想在政坛上争雄,竞选多种政治职位,首先必须获得所属政党的培植与支持。对此,华人已有较清醒的认识,许多华人加入政党,而且积极参加政党活动。1979 年陈香梅女士当选为全美族裔党部主席,对华人的参政很有鼓舞作用,旋即带动东西两岸建立起共和党亚裔党部。1980 年时,陈本昌、陈天枢等在纽约和洛杉矶等地成立起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机构。

民主党人吴仙标于 1984 年 11 月 6 日在特拉华州副州长竞选中,以 120545 对 12031 票击败对手,当选为该州副州长。消息传来,世界华人社会均感鼓舞。吴是教授,由教授学者竞选公职,在美籍华人中尚属首次。作为一次参政的演习和对华人力量的检阅,吴的成功为华人参政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由此便推

动更多华人跃跃欲试。

每一位美国新总统走马上任后,其智囊班子中对亚裔的重视与否、对华人官员任命的多寡也不尽相同。平心而论,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1981—1989)对亚裔比较重视,许多华人出任高职,如陈香梅女士为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张文卫为出口委员会委员、伍观贤为教育部长助理、张之香为国际开发总署助理署长、赵小兰为交通部海事局局长、陈天枢为联邦人权委员会委员、刘成威为联邦大法官等。

继里根之后的布什总统所任命的亚裔公职人员多达 200 位,其中 60% 左右为华人,华人在美国政府中所担任的高职,比任何时候都多,其中有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之香、首位内阁副部长赵小兰。据外刊统计资料说,“布什任命华裔人士之多,职务之高,均史无前例。”

尽管美国华人参政的道路不平坦,并不时有挫折,但华人对参政的重要性和加入主流社会的认识,正在一天天加强,个别华人精英还发起向参政高层的冲刺。1988 年 11 月 8 日的大选,除布什当选总统外,还选举了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美国特拉华州副州长、民主党人吴仙标放弃易于实现的连任副州长职务,改为参加国会参议员的竞选,得到了几乎整个美国华人社会的支持。尽管结果以 84267 对 139610 票败给对手罗斯,问鼎国会山受挫,但由此而引起的全美华人参政热望之炽、助选声势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募集经费和参加投票人数之多,都在美国华人参政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华人中的一些政界人士曾寄望于能有更多华人进入美国政府决策机构。可是一年多来,不但在白宫任职的华人屈指可数,而且都是副职和助理之类的官职。不过在 1993 年的竞选公职中,仍有几位有胆有识的华人出马角逐,当选者计有华盛顿州最大的景郡郡长骆家辉、西雅图市议员

周雪清、贝尔威尔议员李瑞麟、休士顿市议员朱慧爱、亚利桑那州议员黄仕均等。

华人胡绍基因竞选美国等二大城市洛杉矶市市长职位,而成为1993年华人参政的焦点人物。42岁的胡绍基为第三代华人,自1981年起曾担任过三任洛杉矶市市议员,在市区的政坛上有扎实基础。竞选中一路过关斩将,在24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最后和共和党富商赖尔登对垒争夺市长席位。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破传统,以总统身份支持吴绍基竞选;同时胡还得到洛杉矶市广大黑人和亚裔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华人赞助了竞选经费400万元美金中的95%,结果却在复选中失败。在各种条件和形势如此有利的情况下,胡绍基竞选功败垂成,表明全美华人在参政的征途上,所面临的挑战仍是十分严峻的。

从美国官方1990年的人口统计数得知,全美华人共有164万。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华人在国会中应占有4个席位,可自从邝友良和邓悦宁之后,华人在国会中未占一席,而且在50个州中也没有一位华人州长,这和华人人数和所作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相比之下,人数比华裔少一半的日裔已有5位国会议员和一位州长,只有三四十年移民历史的韩国人,也已有一人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由此可见,华人在美国参政要走的路还很长,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更有很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克服,主要有以下几点:

(1)美国华人由于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政治信仰,故山头林立,派系复杂,历来就不团结,被人家看成是“一盘散沙”,这严重削弱了整体力量的发挥,最后导致在竞选中惨遭失败。华人中的嫉妒心、“见不得人好”、“窝里斗”和“告密”现象在选举中屡见不鲜。“亚裔支持布什、奎尔竞选联盟”全国主席祖炳民先生透露,他曾负责向布什总统推荐亚裔人士担任政府公职,可每当白宫考虑任命一些杰出华人时,许多告密

信便蜂涌而至,使白宫不得不重新考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被自己人拉下马”现象。相比之下,日裔和韩裔就非常团结。华人的不团结现象是华人参政取得更大成果的一大障碍。

(2)华人人才济济,但很少晋升到领袖地位,甚至连高级管理人才也不多。究其原因,是对政治仍较淡漠,参政意识仍不够强,被人家看成是“沉默的一群”。许多华人平时注重经济技术,只顾埋头做学问,只顾想方设法赚钱,一旦在经济和技术上取得成就,便算大功告成。许多华人还没有意识到政治是华人在美国立足发展的靠山,有些人虽然对参政也有一定热情,但光出钱,不出力。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程度不深,未能与主流社会融成一片,主动争取别人信赖支持,却过分谦让,缺乏“政治野心”。在美国大选中捐钱的很多华人也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既不要求任命华裔官员,也不要求增加华裔权益,等于白掷钱。这种“含蓄”与“谦让”的政治参与,实在难以与欢喜讨价还价的美国人和犹太人竞争。

(3)大多数华人还不重视选举,不参加选民登记,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历年来投票率太低。华人在旧金山的投票率只有6%,谢国翔在竞选旧金山市议员连任时所得的10万张票中,白人给了他8万张,许多华人不参加投票。谢国翔希望华人的投票率能提高到10%,而日本人在洛杉矶的投票率为43%。1984年11月纽约州众议院竞选时,位于纽约市等62个选区的华埠有6-10万华裔,如果有资格投票的华人都去投票,即可把华人伍球俊推上台。结果伍氏所得华人的票连5%还不到,仅得5019票而败北。纽约皇后区竟没有华人投票的统计数字。此外,华人还缺自己的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许多华人社团都流于亲情联谊和慈善福利。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欧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家哲)